

教育—工作匹配状况对年轻人 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陆杰华 孙 杨

【摘要】教育—工作匹配状况对个人工作与生活的诸多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在教育不断发展、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文章从教育—工作匹配视角出发,运用2018年CFPS数据考察过度教育对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检验了收入、心理等因素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同等教育水平下,教育—工作匹配状况为过度教育的年轻人生育意愿显著更低,且相应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过度教育对女性、西部地区、农业户籍及20世纪80年代出生人群的生育意愿有更为明显的抑制作用。相对于教育—工作适配者,过度教育的工资惩罚客观上降低了机会成本,但过度教育者的收入回报仍为正,其抑制生育的机会成本效应依然显著存在;加之,过度教育还会通过教育失望效应和工资惩罚带来的收入失望效应,降低年轻人的生活期望,进而形成对生育意愿的多重抑制作用。这些机制可能是当代年轻人低生育意愿逐渐由被动转变为主动选择的重要原因。因此,未来人口发展战略的着眼点应充分考虑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衔接关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大市场,深化教育体系改革,从全生命周期和性别公平视角创建生育友好型工作与生活环境,促进“教育—工作—家庭”互益互补。

【关键词】过度教育 生育意愿 收入 生活期望 生育支持

【作者】陆杰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孙 杨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研究缘起

从2013年的“单独两孩”政策到2021年出台的全面“三孩”政策,中国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措施,并配套实施了完善普惠

*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编号:20ZDA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托幼服务、健全生育休假与保险制度、实行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等支持性政策。然而,到目前为止,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发展态势并未真正扭转。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跌破 1.3 的警戒水平,远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低于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自 2018 年起,全国新生人口规模连年下降;2022 年起,全国人口总量开始转入负增长。在这一背景下,深入剖析当前生育率低迷的成因和影响机制,已成为回应时代之问的重要研究议题,也是完善生育支持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政策决策的必然要求。

现有国内外大量文献表明,教育是影响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加里·斯坦利·贝克尔(2009)的经典论著利用时间配置和货币配置模型来解释生育行为,认为教育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存在两种替代机制:一种是生育主体自身的人力资本投入需求对生育的替代或挤出效应;另一种是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挤出生育数量,即孩子的质量替代数量。国内学者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视角对相应机制进行了检验。在微观层面,现有研究发现,生育主体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对生育行为及二孩生育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且高等教育的负向效应尤为明显(刘章生等,2018);相应作用机制主要包括“收入—成本”和“文化—认知”两大路径(周晓蒙,2018;朱州、赵国昌,2022)。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包括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增加也会产生显著的生育抑制效应(贺达,2023),主要原因在于,父母对子女普遍过高的教育期望极易产生社会性教育焦虑,进而对生育数量和二孩生育决策产生负向影响(边恕、熊禹淇,2023)。在宏观层面,教育财政支出、地区教育质量、公共教育满意度等因素影响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王英等,2019;魏炜等,2019;杨华磊等,202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平快速提升。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2020 年全国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9.08 年提高至 9.91 年,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分别上升到 15 467 人和 15 088 人^①。年轻人的教育水平快速提升,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的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突出的就业困境和教育—工作失配问题,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劳动者从事较低学历要求的工作。个人受教育水平超过工作实际所需的过度教育现象,不仅引发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学历贬值与教育内卷等争议,而且极有可能通过收入惩罚及心理健康效应对年轻人的家庭构建、生育决策等态度和行为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教育快速发展和生育率持续低迷的现实背景下,考察教育—工作匹配状况对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理解“教育—生育”关系,而且对统筹考虑教育在社会再生产和人的再生

^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六号),国家统计局,2021 年 5 月。http://www.stats.gov.cn/sj/tjgb/rkpcgb/qgrkpcgb/202302/t20230206_1902006.html.

产中的作用、完善生育养育和教育支持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着重检验过度教育对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影响,从教育—工作匹配的收入及心理效应出发探讨其具体作用机制。本文在以下几方面对既有文献进行拓展。一是首次从教育—工作匹配的视角探究教育影响生育的潜在差异,为深入理解当前的低生育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发现。二是将收入和生活期望纳入“教育—生育”关系的研究框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过度教育影响生育意愿的路径及其内在机制,进一步深化对低生育现象形成机制的认识。三是从性别、地区、户籍、出生队列等角度出发,检验过度教育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异质性,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人口公共政策提供实证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基础教育普及和大规模高校扩招的推动下,劳动力市场出现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失配现象,其中尤以过度教育现象最为多见,这些现象对个人工作和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学术界关于过度教育的讨论最早始于弗里曼(Freeman, 1976)的《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一书,过度教育特指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超过工作实际所需教育水平的一种就业状态,在宏观层面表现为较高学历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在数量及结构上失衡,其直接后果是教育回报率的下降。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两种经济结构并存,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分割,人才区域分布不均衡、流动不充分,以及就业性别歧视,这些因素加剧了过度教育问题(苏丽锋、陈建伟, 2016; 赖德胜、苏丽锋, 2020)。

过度教育的核心是教育与工作匹配不合理。从微观角度来看,过度教育的发生概率不仅与劳动者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有关,而且还取决于受教育程度与工作岗位的匹配状况。因此,考察过度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随着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快速提高,在就业岗位构成变化相对缓慢的情形下,过度教育的发生概率上升,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更有可能出现过度教育。大规模的高校扩招,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伴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生育难度和风险可能因此增加(王一帆、罗淳, 2021);同时,受教育程度提高还伴随着传统性别观念的淡化和多元开放价值观念的形成,传统婚育观念的束缚减小,由此可能进一步降低生育意愿(吴帆、陈玲, 2022)。另一方面,从教育水平与工作岗位的匹配情况看,与教育适配的劳动者相比,过度教育会降低个人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增加工作不稳定性和工作压力(颜敏、王维国, 2018; 彭树宏, 2019),这也是抑制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孙文凯、张政, 2023)。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过度教育对生育意愿具有负向影响。

本研究将收入和生活期望纳入过度教育影响生育意愿的解释框架,构建多重串联中介模型(见图1),从收入配置和心理情感支配两个视角分析过度教育影响生育意愿的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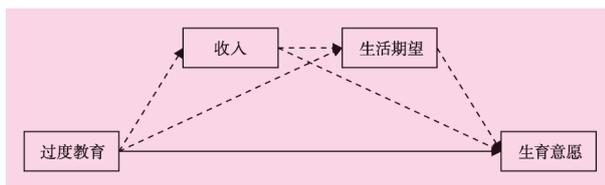


图1 过度教育影响生育意愿的路径示意图

注:实线表示直接作用路径,虚线表示中介路径。

首先,过度教育影响生育意愿形成

过程中的收入获得与配置。一般而言,教育具有收入促进效应。但随着劳动力市场上教育资本供需结构的变化,过度教育问题逐渐凸显,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劳动者从事较低技能水平的职业,人力资本得不到充分利用,导致教育回报不足。从工作竞争和岗位筛选的角度来看,有研究发现,过度教育的劳动者往往个人能力或工作效率较低;因而,在学历相等的情况下,与教育适配者相比,从事较低学历要求的工作使得过度教育者的工资报酬显著更低,即存在工资惩罚效应(颜敏、王维国,2018;周敏丹,2021)。收入的多少决定个人及家庭的消费能力,并影响养育子女的物质基础。在当前育儿成本和教育支出不断攀升的形势下,收入是生育养育决策的重要考量。因而,过度教育可能通过工资惩罚效应导致个人的生育意愿降低。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过度教育会带来工资惩罚,进而抑制生育意愿。

其次,过度教育引起的个人心理健康和主观福祉的变化,可能进一步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接受教育是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途径,也是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发展阶段。然而,当较高学历的劳动者从事低学历足以胜任的工作时,其心理健康往往会受到不利影响。根据 Vroom(1964)的期望理论,个人的心理满足来源于期望的实现。过度教育者不能在职场上充分发挥其人力资本的作用,可能由此产生挫败心理,导致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下降,进而降低对未来生活的期望。Burns(1966)的相对剥夺理论指出,相对于参照对象的比较劣势会使个体产生被剥夺感。与同学历的教育适配者相比,过度教育者从事与自身受教育程度不匹配的低水平工作,其工作报酬、福利、稳定性、职业发展等方面都有可能出现比较劣势,由此产生心理不平衡感,进而降低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彭树宏,2019)。既有实证研究大多印证了这一推断,即过度教育会对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幸福感等主观福祉产生负向影响。例如,李根丽和周泰云(2021)利用2014~2018年CFPS数据得出,过度教育会显著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李桂荣和李文华(2023)的研究也显示,过度教育会降低个人幸福感,教育适配则会显著提升个人基于生活、工作、健康和心理状态的整体幸福感。从影响生育的心理因素来看,Hobcraft等(1995)认为,生育子女需要具备五大基本条件,即婚姻、教育、收入、住房和安全感,其中,安全感是个体的心理状态,包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向栩等(2019)将其解释为幸福感,并论证了幸福感对生育的正向效应;魏炜等(2019)也指出,主观幸福感和满意度等心理因素对生育

意愿具有积极影响。综上所述,对未来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有利于促进生育意愿,负向的生活期望则倾向于降低生育意愿。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过度教育可能降低生活期望,进而抑制生育意愿。

最后,在过度教育影响生育意愿的形成过程中,收入与心理因素共同发挥作用。Solow(1979)的效率工资理论认为,效率工资能够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激发生产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因此,高水平的工资是提升劳动者工作满意度的有效激励手段之一,较高的工资收入和稳定性能够提高个人的幸福感及其对未来生活的期望水平(黄嘉文,2013;邢占军,2011)。此外,较高的收入意味着个体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更有可能在工作和生活中享受良好的工作环境、住房条件、物质生活、社会地位、社会保障等,以满足生存以外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提升生活信心和幸福水平,从而改善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因此,收入提高有利于形成对未来生活的积极心理状态;过度教育对应的工资惩罚有可能会降低劳动者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从而抑制生育意愿。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过度教育会通过工资惩罚降低生活期望,并进一步抑制生育意愿。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CFPS)项目2018年度的成人调查数据。该调查旨在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调查设计和实施的科学性为数据质量提供了保障。该调查的范围覆盖25个省份,调查结果对家庭户具有全国代表性。调查的内容涵盖受访者的基本人口特征、就业、婚育、家庭、观念等详细信息,为本文分析过度教育对生育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基础。

基于前文介绍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框架设计,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根据研究对象的生育特征和现行婚姻法的结婚年龄要求,将年轻人样本限定为20~44岁女性和22~44岁男性;(2)根据工作特征,选取就业状态为在业,就业类型为非农受雇的样本;(3)剔除核心变量缺失值较多、取值异常的样本。出于分析结果稳健性的考虑,本文对样本中实际发生概率较小、占比很小的极端值进行了删截处理^①,同时考虑研究目的和当前育龄人群的实际生育情况,将理想孩子数在4个及以上(4个以上仅占0.29%)的取值合并。最终得到有效分析样本量3091人。

^① 例如删除月工资和年收入分别低于1000元和4000元,以及月工资和年收入最高1%的样本,只保留每周工作时间在20~98小时的样本。

（二）主要变量及其操作化测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生育意愿,是个体在考虑客观约束条件与主观价值观念后表达的一种意愿或偏好。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用理想孩子数衡量个体的生育意愿。具体来说,使用题项“您认为自己有几个孩子比较理想”来测量。分析样本中,被访者的理想孩子数均值为1.7个,填答理想孩子数为1个和2个的样本占多数,其比例分别为28.4%和65.3%;理想孩子数为0个的样本仅占1.8%,3个、4个及以上的样本分别占3.7%、0.8%。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被访者的教育—工作匹配状况,采用众数法进行测量。首先将CFPS问卷中的职业分类与中国GB/T6565-2015职业分类标准进行匹配,剔除军人和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两大类,综合考虑不同职业分类的区别度,选用大类与中类相结合的方式对职业类型进行细分,然后计算每一职业中所有就业者受教育程度的众数,根据该众数将样本划分为3类,等于众数的界定为教育适配,小于众数界定为教育不足,大于众数为过度教育。由于调查样本中教育不足的比例很低,本文将教育不足与教育适配合并(简化起见,下文统称为“教育适配者”),生成表征是否“过度教育”的二分类变量,将过度教育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按照这一操作化方式,分析样本中过度教育占比为28.8%。

按照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考察的中介变量包括收入和生活期望。收入使用小时工资的对数表示,其中,小时工资收入=每月税后工资/(每周工作时间×每月工作周数);使用该变量(而非月收入或者年收入)衡量就业收入能够消除工作长时的异质性影响,提高测量结果的可比性。生活期望反映被访者关于未来生活水平提高的可能性的判断,通过询问“您/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自己‘提高生活水平机会很大’的说法”来测度,回答“同意”和“十分同意”的合并,表示高生活期望,赋值为1;回答“十分不同意”“不同意”“一般”的合并为低生活期望,赋值为0^①。

为了排除其他因素对生育意愿的竞争性解释,本研究参考已有文献的研究发现,考虑被访者的个体特征、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地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被访者的性别、年龄、户籍类型、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婚姻状态、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父辈家务/照料支持、单位类型和所在地区。这些变量的操作方式和分布特征如表1所示。具体来看,分析样本中男性占比(57.6%)略高于女性,被访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265年,约相当于高中以上学历。被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1.535岁,在婚(包括初婚和再婚)比

^① 回答“十分不同意”与“一般”的样本分别仅占0.5%和2.9%,为提高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十分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合并,表示低生活期望水平;其余(“同意”“十分同意”)情况表示高生活期望水平。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N=3091)

变 量	均值 / 百分比	变 量	均值 / 百分比
生育意愿	1.734	婚姻状态(1= 在婚,0= 不在婚)	0.676
过度教育(1= 是,0= 否)	0.288	户籍类型(1= 非农业,0= 农业)	0.365
收入	2.907	单位类型(1= 体制内,0= 体制外)	0.300
生活期望(1= 高期望,0= 低期望)	0.854	健康状况	
受教育年限	12.265	不健康	4.173%
性别(1= 男性,0= 女性)	0.576	一般	7.312%
年龄	31.535	健康	88.515%
所在地区		医疗保险(1= 有,0= 无)	0.910
西部地区	23.358%	养老保险(1= 有,0= 无)	0.700
中部地区	27.887%	父辈照料支持(1= 有,0= 无)	0.489
东部地区	48.754%		

例为 67.6%，拥有农业户籍的受访者占 36.5%，有 30% 的受访者在体制内工作(包括政府部门 / 党政机关 / 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多

数被访者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相应占比接近九成(88.515%)。从社会保障和家庭特征看,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被访者分别占 91.0%和 70.0%,近一半的被访者有父辈提供家务 / 照料支持。

(三) 分析模型设定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生育意愿)为非负计数变量,本文使用 Poisson 回归模型,在控制其他可能产生竞争性解释的因素的基础上,检验过度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净效应。模型形式如下:

$$P(Children_i = y_i | x_i) = \frac{e^{-\lambda_i} \lambda_i^{y_i}}{y_i!} \tag{1}$$

$$\lambda_i = e^{\beta_0 + \beta_1 Overedu_i + \beta_2 Control_i} \tag{2}$$

式(1)中, $Children_i$ 表示被解释变量生育意愿, y_i 表示个体 i 的理想孩子数观测值, x_i 为影响生育意愿的各因素, λ_i 为 Poisson 模型的参数,反映被解释变量的期望值,可以表示为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函数,如式(2)所示。式(2)中, $Overedu_i$ 为核心解释变量过度教育, $Control_i$ 为控制变量集合, β_0 为常数项, β_1 、 β_2 为待估计系数。

为检验收入和生活期望的中介效应,本文进一步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Lnhinc_{i1} = \gamma_{Lnhinc_{i1}} + a_1 Overedu_i + b_1 Control_i + \mu_{Lnhinc_{i1}} \tag{3}$$

$$Hope_{i2} = \ln\left(\frac{P_{i2}}{1 - P_{i2}}\right) = \gamma_{Hope_{i2}} + a_2 Overedu_i + d_{21} Lnhinc_{i1} + b_2 Control_i \tag{4}$$

$$E(Children_i | x_i) = \lambda_i = e^{\gamma_{Children} + c' Overedu_i + d_{22} Lnhinc_{i1} + d_{23} Hope_{i2} + b_3 Control_i} \tag{5}$$

其中, $Lnhinc_{i1}$ 和 $Hope_{i2}$ 分别表示小时工资收入的对数与生活期望,根据这些变量的测量等级,分别使用 OLS 和 Logit 连结函数拟合模型,如式(3)和式(4)所示; $\gamma_{Lnhinc_{i1}}$ 、 $\gamma_{Hope_{i2}}$ 和 $\gamma_{Children}$ 为常数项, a_1 、 a_2 、 c' 、 d_{21} 、 d_{22} 、 d_{23} 、 b_1 、 b_2 、 b_3 为待估计系数, $\mu_{Lnhinc_{i1}}$ 为误差项。通过上

述多重中介模型的拟合结果,可以估算过度教育经由不同作用路径影响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其一是过度教育通过影响收入对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其二是过度教育通过影响生活期望对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其三是过度教育经由收入、生活期望对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具体路径参见前文图 1)。

四、主要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拟合方法检验过度教育对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如表 2 所示。模型 1 仅加入了过度教育和受教育年限,模型 2 至模型 4 依次加入其他个体特征、社会因素、家庭及地区特征的控制变量。所有模型结果均显示,在控制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影响后,过度教育对被访者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应系数在各模型之间保持高度稳健,印证了过度教育对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为假设 1 提供了经验支持。

从控制变量的拟合结果来看,个体特征、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地区特征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个人生育意愿。以模型 4 为例,相对于女性,男性的生育意愿更高,这与既有研究发现相吻合(周晓蒙,2018),反映了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和直接承担者,在生育养育过程中往往比男性付出更多、担负更多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因而其生育意愿显著更

表 2 过度教育影响生育意愿的 Poisson 回归结果(N=3091)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过度教育	-0.033 ^{**} (0.015)	-0.037 ^{**} (0.015)	-0.032 ^{**} (0.015)	-0.030 ^{**} (0.015)
受教育年限	-0.014 ^{***} (0.002)	-0.007 ^{***} (0.002)	-0.008 ^{***} (0.002)	-0.008 ^{***} (0.002)
性别		0.049 ^{***} (0.012)	0.042 ^{***} (0.013)	0.042 ^{***} (0.013)
年龄		-0.001(0.001)	0.001(0.001)	0.001(0.001)
户籍类型		-0.079 ^{***} (0.015)	-0.085 ^{***} (0.016)	-0.085 ^{***} (0.016)
健康状况(参照组:不健康)				
一般		-0.065(0.047)	-0.064(0.047)	-0.065(0.047)
健康		-0.044(0.041)	-0.043(0.041)	-0.044(0.041)
婚姻状态		0.122 ^{***} (0.016)	0.112 ^{***} (0.017)	0.111 ^{***} (0.017)
医疗保险			0.007(0.024)	0.004(0.024)
养老保险			-0.009(0.015)	-0.007(0.015)
父辈照料支持			0.027 ^{**} (0.013)	0.028 ^{**} (0.013)
单位类型			0.028 ^{**} (0.014)	0.023(0.014)
所在地区(参照组: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0.006(0.015)
东部地区				-0.032 ^{**} (0.014)
常数项	0.735 ^{***} (0.023)	0.634 ^{***} (0.063)	0.631 ^{***} (0.067)	0.639 ^{***} (0.068)

注: *、**、*** 分别表示在 0.1、0.05、0.01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低。与农业户籍相比,非农业户籍被访者的生育意愿显著更低,这也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吻合(吴帆、陈玲,2022),反映了城乡生育观念、生育养育的时间及机会成本等方面差异的综合影响。相对于不在婚的被访者,在婚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显著更高。父辈照料支持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印证了父辈的照料支持对降低年轻人生育的时间及机会成本、提升生育意愿的重要支持作用(於嘉等,2023)。

此外,工作单位为体制内的被访者生育意愿显著更强,这可能反映了体制内工作的收入更稳定、社会保障更完善,因而被访者的生育意愿相对更高。不过,在加入地区特征变量后,工作单位类型的边际影响不再显著。这可能与不同单位类型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有关。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显著更低,但中部地区年轻人的差异不显著,这可能与各地区生育养育成本和传统生育文化的差异有关。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结合可能影响分析结果的因素,分别采用更换核心变量的测量方法与模型设置、剔除极端值、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重新拟合模型以考察过度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1. 更换测量方法与分析模型

过度教育的测量方式可能影响分析结果。为检验相应影响,本文参考学界常用的方法(李建民、陈洁,2017;颜敏、王维国,2018;赵昕、蒋文莉,2023),依次使用美国职业准入教育标准、基于六大职业类型的众数法重新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测量并拟合模型,结果如表3模型5和模型6所示。另外,考虑到目前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3)和样本中生育意愿均值(约1.7)均低于2,本文将被解释变量转化为衡量理想孩子数是否不低于2个的二分变量(是=1,否=0),拟合Logit模型,结果如表3模型7所示。模型5至模型7的结果显示,在更换核心变量的测量方法和分析模型后,过度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依旧显著为负,支持了基准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2. 剔除极端值

变量的极端取值可能会降低模型的稳健性甚至造成结果偏误。为排除相应影响,本文通过剔除部分极端值、缩小样本范围重新拟合模型,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具体操作为,剔除小时工资大于100元、年收入小于10000元、职业要求的教育程度与个人受教育程度相差超过3级的样本^①,并将女性和男性被访者分别限制为23~39岁和25~

^① 职业要求和劳动者实际受教育程度分别按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划分,二者相差超过3级则可能为异常值,比如职业要求教育程度为小学,劳动者实际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及以上。

39岁的黄金生育年龄段。模型拟合结果(见表3模型8)显示,在剔除极端值和重新限定样本范围后,过度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仍显著为负,即过度教育的就业状态会显著降低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印证了基准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3. 倾向得分匹配

为排除样本选择性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样本中过度教育者与非过度教育者的主要特征进行平衡性处理。在运用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局部线性匹配、样条匹配等方法平衡样本后,过度教育者相对于非过度教育者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均显著为负(如表4所示),进一步支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3 更换测量方法与分析模型稳健性估计结果

变 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过度教育	-0.035 ^{**} (0.017)	-0.041 ^{***} (0.014)	-0.207 ^{**} (0.096)	-0.038 ^{**} (0.018)
N	3091	3091	3091	2222

注:各模型的控制变量同表2模型4。

表4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N=3091)

变量	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局部线性匹配	样条匹配
	ATT	ATT	ATT	ATT	ATT
D	-0.081 ^{***} (0.029)	-0.073 ^{***} (0.023)	-0.076 ^{***} (0.025)	-0.069 ^{***} (0.023)	-0.077 ^{***} (0.026)

(三) 异质性分析

如前所述,当前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区域人才分布不均衡且存在流动性障碍,就业性别歧视突出。这些因素可能影响过度教育的发生情况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忽视这些维度的差异会掩盖群体间因就业市场分割、经济文化特征不同而导致的异质性,不利于全面理解过度教育对年轻人生育意愿的作用。为此,本文从性别、地区、户籍类型和出生队列的维度出发,考察过度教育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异质性,模型结果如表5所示。

从性别差异看,在考虑了控制变量的影响后,过度教育仍对女性的生育意愿具有显

表5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 量	性别		所在地区			户籍类型		出生队列		
	女性 (模型 9)	男性 (模型 10)	东部 (模型 11)	中部 (模型 12)	西部 (模型 13)	农业户籍 (模型 14)	非农业户籍 (模型 15)	70年代 (模型 16)	80年代 (模型 17)	90年代 (模型 18)
过度教育	-0.055 ^{**} (0.025)	-0.014 (0.019)	-0.029 (0.023)	-0.011 (0.028)	-0.051 [*] (0.029)	-0.032 [*] (0.020)	-0.020 (0.025)	-0.003 (0.043)	-0.051 ^{**} (0.023)	-0.014 (0.024)
N	1310	1781	1507	862	722	1964	1127	524	1446	1121

注:分性别、所在地区和户籍类型的异质性分析模型中分别只删除控制变量性别、所在地区、户籍类型,各模型中其余控制变量同表2模型4。

著的负向影响(见模型 9),但对男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见模型 10)。可能的解释有:其一,女性既是生育的直接行为主体,也是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的主要承担者,因而,女性的教育—工作匹配状况更有可能影响其生育意愿;其二,就业性别歧视加重了女性求职和职业发展的压力,客观上推动女性接受更高的教育,增加其出现过度教育的可能性和生育惩罚程度(周晓蒙,2018;朱州、赵国昌,2022)。因此,过度教育对女性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从地区及户籍差异看,过度教育仅对西部地区的被访者、农业户籍被访者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受地区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和农业户籍的年轻人生育意愿往往相对较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流动性障碍的影响下,有可能强化过度教育对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从队列差异看,过度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队列中显著,其系数为负。可能的原因是,20 世纪 80 年代的出生队列受 1999 年开始的高校扩招影响最大,群体内部过度教育差异明显,因而,过度教育对相应队列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

(四) 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理论分析指出,过度教育对年轻人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可能通过工资惩罚、降低未来生活期望等中介机制发挥作用。为检验相应作用机制,本文拟合了中介效应模型,结果如表 6 和图 2 所示。

首先,过度教育对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见模型 19),印证了过度教育的工资惩罚效应,与既有研究结论相吻合(颜敏、王维国,2018;周敏丹,2021)。不过,收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见模型 22),在其他特征可比的情形下,高收入者的生育意愿平均较低,与研究假设 2 相反。可能的解释是,较高的工资收入往往意味着较高的机会成本,这体现为生育的机会成本效应,与以往研究发现一致(朱州、赵国昌,2022)。该路径的中介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教育—工作匹配者,过度教育的收入回报率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机会成本效应。但进一步分析发现,从劳动力市场整体来看,过度教育多发生于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N=3091)

	模型 19	模型 20	模型 21	模型 22
收入(OLS)				
收入(OLS)				
生活期望(Logit)				
生育意愿(Poisson)				
过度教育	-0.073*** (0.021)	0.068*** (0.020)	-0.269** (0.125)	-0.031*** (0.015)
收入			0.517*** (0.110)	-0.042*** (0.012)
生活期望				0.072*** (0.019)

注:模型 19、模型 21、模型 22 均控制了表 2 模型 4 中个体、社会、家庭、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模型 20 仅控制了受教育年限以外的其他控制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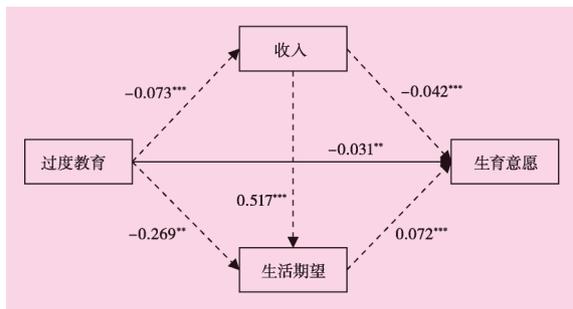


图 2 过度教育影响生育意愿的中介机制检验图

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见模型 22),在其他特征可比的情形下,高收入者的生育意愿平均较低,与研究假设 2 相反。可能的解释是,较高的工资收入往往意味着较高的

机会成本,这体现为生育的机会成本效应,与以往研究发现一致(朱州、赵国昌,2022)。该路径的中介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教育—工作匹配者,过度教育的收入回报率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机会成本效应。但进一步分析发现,从劳动力市场整体来看,过度教育多发生于

高学历群体,过度教育者面临的工资惩罚并非无限度的惩罚,其教育回报率依然为正(傅琼,2023;李新荣等,2023),这在删除控制变量受教育年限后拟合的模型 20 中可以得到验证,因而本文认为生育的机会成本效应在处于过度教育状态的年轻人中依然存在。

其次,过度教育对年轻人的生活期望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见模型 21)。年轻人在较高的教育水平与较低的工作任务要求之间会形成期望偏差,由此在工作和生活中产生挫败感与失望情绪,对未来消极的生活期望状态大大降低了生育意愿。同时,相比于低生活期望的年轻人,拥有高生活期望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显著更高(见模型 22),印证了过度教育通过降低生活期望进一步抑制生育意愿的假设 3,即过度教育会带来抑制生育意愿的教育失望效应。

再次,收入对年轻人的生活期望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见模型 21)。收入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激励效应,提升个人信心和幸福感,进而形成对未来生活积极的心理期望(黄嘉文,2013;邢占军,2011),也即收入具有幸福效应。但由于过度教育的工资惩罚效应(模型 19)会降低年轻人对未来生活的心理期望(见模型 21),带来一定程度的收入失望效应,因而造成对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进一步抑制,假设 4 得到验证。

综合以上中介效应分析结果,相比于教育—工作适配的年轻人,处于过度教育状态的年轻人的收入回报率降低,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高机会成本对其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但这种生育的机会成本效应依然显著存在。更重要的是,过度教育会通过教育失望效应和工资惩罚带来的收入失望效应,形成对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多重叠加的抑制作用。教育—工作匹配状况不仅会导致工资收入的直接变化,还会引起年轻人内在心理状态的改变,因而当代年轻人较为普遍的低生育意愿可能是从被动放弃逐渐转变为主动选择的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教育—工作匹配的视角,实证检验了现阶段过度教育对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影响,通过将收入和心理机制纳入分析框架,剖析了过度教育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内在作用机理。总体上看,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过度教育显著负向影响生育意愿。这一研究发现从教育—工作匹配的视角拓展了教育与生育关系的视域。过度教育突显了当前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配问题,相应现象会导致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降低,并对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产生抑制效应。因此,如何在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设计中推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衔接和优化匹配,促进教育、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值得关注的议题。

第二,过度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性别、户籍、地区和队列异质性,具体表现为,过度教育显著负向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对男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相对于东

部地区和非农户籍人口,过度教育对西部地区和农业户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相对于“70后”和“90后”(即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人群),过度教育对“80后”的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这些结果可能反映了不同性别、户籍、地区和队列的群体之间过度教育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的差异性,由此推断,过度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具体影响及其机制可能呈现人群异质性。

第三,过度教育对年轻人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通过收入惩罚、降低心理期望等机制发挥作用。在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情形下,就业竞争不断加剧催生的学历贬值、教育内卷等现象,导致教育—工作匹配状况中过度教育现象不断上升。因此,探讨教育与生育的关系,需要关注个体在这一过程中期望和情感的相对剥夺以及工资惩罚所导致的心理变化,即心理失望效应。这些机制可能是导致当代年轻人较为普遍的低生育意愿逐渐从被动放弃转变为主动选择的重要原因。

从上述结论可以看出,未来进一步优化人口发展战略需要充分考虑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衔接关系,根据教育与工作匹配的实际制定人口公共政策。为有效提高生育意愿,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多层次生育支持体系,组成国家、市场、家庭和个人共同行动体,有效平衡好教育、工作、家庭之间的关系(陆杰华,2023)。

具体而言,一方面,针对目前过度教育现象越来越普遍的问题,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劳动力大市场,促进社会保障基本制度城乡统筹发展,消除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通过更加完备的人才激励政策和配套服务措施,缩小同等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下就业的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和单位体制差异,促进人才的跨区域流动,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教育评价机制,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大力培养应用型专业技能人才,使劳动者能够找到与自身受教育水平相匹配的工作,实现与之相适应的收入回报、社会地位和职业发展前景。此外,教育既影响“生不生”,也关乎“怎么育”,是两代人共同面对的问题。探索适当缩短从小学到高中的基础教育阶段学制,大学与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也可以适当缩短,从而减少父母教育机会成本和子女养育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初婚和初育年龄不断推迟的趋势。另一方面,关于工作与家庭的关系问题,要从促进性别公平的视角对工资待遇、工作时间、职业晋升、生育保险与休假等环节完善多层次生育福利保障体系,加强健康工作心理建设,完善配套工作激励和生育奖励机制,提高工作满意度,在收入、时间和职业发展上给予家庭更大的生育平衡余地。同时,保障育龄群体尤其是女性的劳动和生育权益,消除生育惩罚,既要促进职业发展也要体现生育关怀,营造生育友好型工作环境,形成“工作—家庭”互益互补的生产生活新格局。

参考文献:

1. 边恕、熊禹淇(2023):《内卷背景下教育期望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和机制分析》,《人口与发展》,第5期。
2. 傅琼(2023):《教育错配与薪资效应》,《浙江社会科学》,第4期。
3. 贺达(2023):《费钱还是费力?家庭教育投入对生育意愿的抑制及调节效应分析》,《人口与发展》,第4期。
4. 黄嘉文(2013):《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一项基于CGSS2005的实证分析》,《社会》,第5期。
5.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著(2009):《家庭论》,王献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6. 赖德胜、苏丽锋(2020):《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贡献》,《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期。
7. 李根丽、周泰云(2021):《教育错配会影响工作满意度吗——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8期。
8. 李桂荣、李文华(2023):《教育匹配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9. 李建民、陈洁(2017):《中国过度教育的测度——基于美国职业准入的教育标准》,《人口与经济》,第5期。
10. 李新荣等(2023):《过度教育的经济学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第9期。
11. 刘章生等(2018):《教育如何影响中国人的“二孩”意愿?——来自CGSS(2013)的证据》,《公共管理学报》,第2期。
12. 陆杰华(2023):《完善中国特色生育支持体系的多层次福利保障》,《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13. 彭树宏(2019):《中国教育—工作匹配现状及其影响效应》,《劳动经济研究》,第5期。
14. 苏丽锋、陈建伟(2016):《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高等教育人才供给与配置状况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15. 孙文凯、张政(2023):《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人口学刊》,第2期。
16. 王一帆、罗淳(2021):《促进还是抑制?受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分析》,《人口与发展》,第5期。
17. 王英等(2019):《地区教育质量对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来自CGSS2015经验证据》,《西北人口》,第4期。
18. 魏伟等(2019):《主观幸福感、公共教育满意度对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实证分析》,《社会发展研究》,第3期。
19. 吴帆、陈玲(2022):《当代中国年轻人低生育意愿背后的文化机制及其政策意涵》,《公共行政评论》,第5期。
20. 向栩等(2019):《幸福的生育效应——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西北人口》,第6期。
21. 邢占军(2011):《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22. 颜敏、王维国(2018):《教育错配对工资的惩罚效应——来自中国微观面板数据的证据》,《财经研究》,第3期。
23. 杨华磊等(2020):《教育支出规模与方式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人口与发展》,第2期。
24. 於嘉等(2023):《中国育龄人群生育潜力影响因素的随机实验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25. 赵昕、蒋文莉(2023):《农民工过度教育及其收入效应——基于技能适配视角的探讨》,《农业技术经济》,

- 第2期。
26. 周敏丹(2021):《教育—工作错配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实证研究》,《劳动经济研究》,第5期。
 27. 周晓蒙(2018):《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对城镇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人口与经济》,第5期。
 28. 朱州、赵国昌(2022):《高等教育与中国女性生育数量》,《人口学刊》,第1期。
 29. Burns T.(1966), Review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 by W.G. Runcima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7(4):430-434.
 30. Freeman R.B.(1976), *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31. Hobcraft J.N., Kiernan K.E.(1995), Becoming a Parent in Europe. In *Evolution or Revolution in European Population. European Population Conference. 1 Plenary Session*:27-65.
 32. Solow R.M.(1979), Another Possible Source of Wage Stickiness.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1(1):79-82.
 33. Vroom V.H.(1964), *Work and Motiv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The Impact of Education–Job Matching on Fertility Intention of Young Adults

Lu Jiehua Sun Yang

Abstract: Education–job matching has important impacts on individuals' work and lif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ffect of overeducation on fertility intention of young adults using the 2018 CFPS data, by incorporating income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to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with multiple mediation mechanisms. We find that overeducation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affects fertility intention, which holds robust in a series of test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overeducation has more salient suppressing effects on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women, those living in western region or in rural areas, and people born in the 1980s. Compared with the state of education–work adaptation, although the wage punishment of overeducation reduces the opportunity cost, the opportunity cost effect of restraining childbearing still exists significantly. What's more, overeducation has multifaceted inhibition effects on fertility intention from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through the disappointment effect of education and the income disappointment effect caused by salary punishment, which makes the young adults' low fertility intention changing gradually from a passive choice to an initiative one. This study concludes with a policy suggestion on the population strategy to fully conside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labour market. And it is important to construct a unified national labor market, reform our education system, create a fertility–friendly and gender–equal environment covering the entire life cycle, and promote the complementarity of education, work and family.

Keywords: Overeducation; Fertility Intention; Income; Life Expectation; Fertility Support

(责任编辑:牛建林)